

医师
群体

尹倩◎著

MINGUOSHIQIDEYISHIQUNTIYANJIU
民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
(1912—1937)——以上海为讨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医师
群体

尹倩◎著

MINGUOSHIQIDEYISHIQUNTIYANJIU
民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
(1912—1937)——以上海为讨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1912—1937): 以上海为讨论中心/尹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61-3459-7

I. ①民… II. ①尹… III. ①医师—研究—上海市—1912—1937
IV. ①R1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17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王 曦
责任编辑 刘晓红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民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1912-1937）——以上海为考察中心”

（10YJC770112）

序 言

尹倩博士历经多年专题研究而精心撰写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1912—1937）——以上海为讨论中心》即将出版，可谓为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研究奉献了一部学术力作，值得向近代史学术界予以推荐。

就研究对象而言，这部著作探讨的医师群体属于民国时期比较特殊的自由职业者群体。在近代中国，群体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新兴社会群体的产生，是社会变迁的具体反映和必然结果。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促成了包括律师、医师、会计师、工程师、审计师、教师、记者在内的许多新社会群体的诞生。这些新群体大多属于社会中间层，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对此予以认真探讨当可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

学术界虽较早已开始透过社会群体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但在研究方法和视野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缺陷。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侧重于政治史的单一研究范式，对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政治反抗斗争的笼统性论述较多，对上层官僚群体的研究则多限于揭露其腐朽和反动的一面，论述的具体内容也大都是官僚群体如何对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很少结合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与分析，也难以揭示上层官僚群体和下层民众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全貌。另一个缺陷是忽视了对许多重要新兴社会群体的探讨，例如前面提及的律师、医师、会计师、工程师、审计师、教师、记者等许多新兴的社会群体，长期以来都很少有人论及。即使是以往重视下层劳动人民的研究，但也仍有不少下层社会群体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存在着许多研究空白或薄弱环节。

近 20 余年来上述情况得到明显改变,学界出现“眼光向下”的研究趋向,使社会群体的研究更趋细化。在对原有的“统治阶级”进行细分的同时,也对普通的“被统治阶级”进行解构,上至官绅,下至小市民,都被作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一点,在上海史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海内外学者通过到上海搜集资料、实地考察,对于近代上海的社会群体进行广泛深入研究。不论是叱咤风云的商政人物,还是市井人物、普罗百姓,都已有丰富的论著为之立志。研究的主题从政党、商会、道台、市长、警察、帮会、同乡会、苏北人、资本家、商人、工人,到跑马、跑狗、妓女、乞丐,应有尽有。通过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全貌、近代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坐活实况得以重新建构,也充分体现了社会群体研究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与作用。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关注“中层社会”研究的新趋向,作为中间阶层的自由职业者群体也随之开始逐渐进入海内外研究者的视域,并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成果。

研究近代中国的自由职业者群体,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不乏现实借鉴意义。其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弥补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不足,丰富和完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还将促进相关行业史和社会团体研究的发展,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严重薄弱环节。近代中国每一个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都伴随着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长期以来,近代史学界不仅对这些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研究很不充分,而且对其赖以依成和发展的所属行业也缺乏探讨。而研究近代各个自由职业者群体,首先就需要对其所属行业的产生与发展进行考察,随之将可以带动如律师业、医师业、会计师业、工程师业等许多新兴行业史研究的发展,进而对促进整个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展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形成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成立了自己的同业团体,如律师公会、医师公会、会计师公会等,有的还建立了其他一些社会团体,并依靠这些团体规范和维系同业的职业活动和开展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对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考察,也势必会促进学术界对这些团体进行研究,从而弥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又一薄弱环节。

就现实意义而言,自 1949 年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的冲击下,以专业知识自重、以市场需求自立的自由职业者多被纳入到国家事业或者公

营单位之下，成为单位制度之内的国家职工，或者失去社会存在的基础，归于消逝。但这种单位体制并不一定符合一个开放社会的需求。自改革开放之后，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重新发展起来，其规模与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所谓中产阶级、中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的自由职业者的观念、组织情况与近代虽有所差异，但其发展也存在内在一致性。因此，深入考察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构建也会有所助益。

尹倩这部专著中探讨的医师群体，在现今中国社会中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争议不断的医患关系似乎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而其现实借鉴意义更强。本书考察了民国时期医师群体概况，包括中医的渊源和传承、西医的产生和发展、医师的执业方式、收入及生活等；分析了民国时期医师的专业化历程，内容涉及医师的登记与注册、医师专业团体的兴起、发展与自治追求；论述了贯穿民国时期中西医之间学术分歧、职业竞争、身份定位、矛盾冲突等似敌似友的复杂关系；也详细阐明了民国时期的医病关系，并深入探究医病纠纷的历史渊源、民国时期的医病纠纷概况、医论之解决途径等；最后还考察了医师群体与民国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展现了医师群体的社会责任以及作用与影响。

一般而言，本书对民国时期医师群体的考察内容称得上较为全面，分析也较为深入，并且提出了一些具有启迪意义的学术见解。另在史料的挖掘方面，本书也充分注重利用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报刊等各方面史料，既为本书的论述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也为本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资料线索。当然，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本书肯定也不可避免地在许多方面存在不足，相关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不仅将使作者本人受益，而且也有助于促进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朱英

目 录

绪论	(1)
一 本书旨趣与意义	(1)
二 学术史的回顾与分析	(2)
三 相关理论与概念	(8)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16)
 第一章 民国时期医师群体概况	(18)
第一节 民国时期医师群体的发展	(18)
一 医师群体的发展背景	(18)
二 中医的渊源和传承	(28)
三 西医的产生和发展	(35)
第二节 医师的职业生活	(44)
一 医师的执业方式	(45)
二 医师的收入及生活	(55)
 第二章 自律与他律:医师专业化之路	(65)
第一节 专业团体的兴起与发展	(65)
一 职业观念的萌发	(66)
二 从学会到公会	(69)
三 医师团体的联合与分化	(77)
第二节 医师的登记与注册	(87)
一 医师管理之渊源	(87)
二 中央政府与医师团体围绕登记之纷争	(92)
三 上海地方登记之具体实施	(106)

第三节	专业医团的自治追求	(116)
一	组织形式与治理机制	(116)
二	权益维护	(126)
三	市场规范	(134)
第三章	冲突与融合:民国时期中西医关系	(145)
第一节	似敌似友的同行	(145)
一	学术分歧	(145)
二	职业竞争	(152)
三	身份定位	(158)
第二节	冲突中的发展	(161)
一	中西医之争	(161)
二	西医的本土化	(167)
三	中医的“科学化”	(172)
第四章	责任与信仰:民国时期的医病关系	(181)
第一节	现代医病关系的构建	(181)
一	医病关系的近代转变	(182)
二	建设现代医德	(194)
三	培养“现代”病人	(202)
第二节	欲理还乱的医病纠纷	(210)
一	医病纠纷的历史渊源	(210)
二	民国时期的医病纠纷	(213)
三	医讼之解决途径	(219)
第五章	强种与救国:医师与民国社会	(232)
第一节	医学救国的理想与实践	(232)
一	构建医疗卫生体系	(233)
二	传播医疗卫生知识	(238)
三	塑造“健康国民”	(243)
第二节	医师的政治责任与社会参与	(256)
一	社会事务的参与	(256)

二 民主政治的追求	(264)
结语	(271)
一 医师的专业化	(271)
二 医师、国家与社会	(274)
参考文献	(276)
后记	(285)

也吸纳了移植中的现代元素。作为专业群体,当它面对政府时,它代表了社会的呼声;当它面对民众时,又力图树立其绝对的权威。同时,它不仅有其医学背景所赋予的专业性色彩,也有来源于特定时代与社会的公共性的一面。变与不变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专业性与公共性的结合等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的特征在医师群体自身发展和活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以其固有的中国文化底蕴,留学欧美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以及西方职业化的道德理念和行为模式服务于一个处于新旧交替,历“亘古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其产生的时代条件、文化氛围、社会背景以及自身的经济基础、政治倾向、文化认同和社会活动等均值得剖析研究。考察近代医师群体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其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不仅可以填补近代医师群体研究及自由职业群体研究的空白,而且对推进近代社会群体研究和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此外,本书还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职业群体所应该拥有的权利和应负的责任还在探讨之中;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医政关系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建立一个公平高效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仍是我国追求的目标。这些都能从对民国时期医师群体的研究和考察中得到历史经验和借鉴。

二 学术史的回顾与分析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医师群体的研究主要遵循了两条截然分开的研究路径,即医学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路径。

从医学史的研究来看,中国医学史尤其是古代医学史的研究,历史悠久且成果丰硕。中国医学史研究最早始于司马迁,《史记》记述了战国名医秦越人及西汉名医淳于意,而对于医事制度的记载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周礼》。事实上,医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历代修史书者都要对医事制度、医界名流、医学名著及疾病灾荒等加以记述。到了唐代,我国出现了最早的名医传记《历代名医列传》(甘伯宗著);明代,李鏊的《医史》(1513)首次提出了“医史”一词;清代,开始出现医史的史论作品,如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1759)。然而,上述著作多半只为后人提供一些真实的史料,很少涉及医史经验的总结和客观规律的论证,医学史并未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另立门户。

到了近代,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有造诣的医史学家和医学通史。最具代表性的有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1919),该书于1932年、1954年、1957年多次修订再版,并有日文译本。该书为中国第一部医学通史,我国系统研究医学史著作的开始,伍连德称其为“空前之杰作矣”。1932年出版了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国医史》),是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医学通史。伍连德、王吉民是中华医史学会的创始人,此书在近代西洋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方面,记述甚详,内容丰富,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如教会、海关中有关资料),对西医在我国逐步成长的历史作了翔实记载。旨在向国内外人士介绍和宣传中国历代医学发明和发展,学术影响较大,遗憾的是这部皇皇巨著几乎没有涉及中国近代医学史,对医师本身的关注亦不多。

民国时期还相继出版了一些中国医学史的专著,如1924年出版的《中国医学史大纲》、1931年出版的《中世纪中医的历史》、1935年出版的《中国医学家传记》、谢观(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1935)、范行准的《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1943)等。其中李涛的《医学史纲》(1940)则是我国第一部中西医史合编的医史专著,《医学史纲》和陈邦贤、王吉民、伍连德之著作被认为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医学史研究成果。

医史研究机构和杂志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医学史研究的发展。建立于1935年的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是中华医学会成立最早的两个专科学会之一,虽然其间历经沧桑,多次因故中辍,但学会的成立促进了医史学的学术研究和经验交流,对中国医学史学科之建立、研究领域之扩大、科研教学水平之提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创刊于1947年的《医史杂志》,问世后发展的历程堪称坎坷,曾三次易名二度停刊。直至1980年正式复刊,称为《中华医史杂志》,由陈海峰、程之范、李经纬等先后任总编,医史界著名学者大多参加了编委工作。从此走上正规发展的道路,以季刊的形式稳定发行至今,成为医学史成果发布的重要基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医学通史著作不断出版,如赵洪钧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1982),范行准的《中国医学史略》(1986),李经纬、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

(1987),李经纬等的《中国古代医学史略》(1989),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1991),廖育群的《岐黄医道》(1991),马伯英等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1993)及《中国医学文化史》(1994),李经纬主编的《中外医学交流史》(1998),邓铁涛主编的《中医近代史》(1999)等20余种通史著作先后问世。在医学起源、医史分期、医学人物评价、疾病史、专科史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成果^①。由于这些研究者大多是医学界内的专业人士,其研究成果侧重于医学或医疗制度的发展,视野大多局限在技术层面,不能将疾病模式的流变、医疗水平的进展置于历史的情境加以考察,在资料的利用上,除了早期像范行准等老一代学者外,基本均以医籍为主,对历史上其他相关史料(比如地方志、文集、笔记小说等)的利用相当欠缺。这些都使得医学史的研究局限于科技史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加之中国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烈的亲缘关系,中国医学文化史研究事实上在80年代后期蓬勃兴起,不仅出现了不少讨论医学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还明确提出了“从简单讲述医学成就和医学人物到重点转向考察医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的相互关系,以揭示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影响”的发展方向^②,这无疑拓展了中国医学史的研究空间,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医学的特质与演变。但“目前的研究基本都将中国医学本质化了,致使医学文化几乎成了一种完全抽象的认识和理论,因此,仍然无法做到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认识疾病、医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③。同时,医学史领域内对医师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著名医学家的医学、教育等领域成就的表述和评价上,就算是标明为传记的文章中看到的只是“某某学家”而不是医师这个“人”,其论述内容多是传主的医学成就及对我国医疗事业所做的贡献上,而对于其生存状态并没有过多探讨。而且,对医师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医师在现实中的运作以及医师群体本身的构成、特征以及职业的发展程度等问题也很少涉及,不能不说是医学史研究的一大遗憾。

① 参见李经纬、张志斌《中国医学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

② 张志斌:《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2005年学术年会纪要》,《中华医史杂志》2006年第1期。

③ 余新忠:《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

在社会史的研究方面，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灾害等密切相关的医疗社会史也开始得到关注。疾病医疗史的探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如曹树基的《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70本第1部分）；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李玉尚、曹树基的《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杨念群的《“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化》（《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或引入以往被忽视的疾病医疗因素来更好地解释某些历史现象，通过对疾病医疗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和钩沉，揭示某些重要而以往忽视的历史面相；或探讨疾病和医学的变动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或以疾病医疗本身或相关的某一内容为切入点，在一定问题意识的指引下，表明、分析或诠释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医疗社会史的发展，也给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同时，医疗行为的实施者——医生也开始走入研究者的视野。虽然数量不多，还属于初步探索阶段，但足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医生的身份和地位

古代医生的角色和地位同时吸引了医学界和史学界学人的注意。福建中医学院刘理想的硕士论文以我国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为研究对象，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论述了对我国古代各时期医生社会地位的情况变化以及其对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①。金仕起则专门讨论春秋至两汉医者地位与身份，并分析其中的社会、文化原因^②。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近代以来医师的角色和地位却还几近空白，除了在医病关系的探讨中有所涉及外，并没有专门的研究。近代以来的医师与古代相比，其地位和角色有何变化

① 刘理想：《我国古代医生社会地位变化及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福建中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② 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兼论其身份与地位》，《新史学》1995年第1期。

及其原因,对自身乃至社会有何影响,都有待考察和研究。

(二) 医病之间的关系

台湾学者张哲嘉和雷祥麟对此关注较早,他们把目光聚集在近代以来的医病关系的变化上,从中探询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轨迹^①。杨念群则透过对近代以来医病关系变化来考察中国政治空间和社会控制上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源和普通民众具有重要的能动和形塑作用这一观点做了申论^②。张斌从医学的角度对民国时期医事纠纷的研究后认为当时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没有相应的保护团体是当时医疗纠纷较多的重要原因^③。这些成果对近代以来医病关系的转变都作出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但在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及其影响,医病双方的态度都还有相当的研究空间。而医事纠纷更可为考察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新的视角,值得深入研究。

(三) 中西医的关系

与医学界主要关心的中西医学上的差别和联系不同,史学界和文化学界的学者主要关注近代以来中西医之间的纷争所隐含的文化意义。赵洪均的《中西医论争史》是最早全面论述中西医之间纷争的专著,之后不少学者也对这一系列事件进行回顾和评述。近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走向深入。张鸣的《旧医,还是中医?》、邓文初的《失语的中医》等特别关注了中医在这系列纷争中尴尬的局面^④。左玉河截取了1929年中医废存之争的过程加以论述,指出这场废存之争不是简单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医界为谋求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抗争,抗争结果是中医逐渐走上了自我革新

① 张哲嘉: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ysician - 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1874 - 1908)*,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8。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新史学》第14卷第1期。

②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张斌:《民国时期医事纠纷的研究》,《中国医学伦理学》2003年第6期。

④ 张鸣:《旧医,还是中医?》,《读书》2002年第6期;邓文初的《失语的中医》,《读书》2004年第3期。

与科学化之路^①。郝先中更是把中医存废之争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深入探讨了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背景和根源，并运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理论，解读影响中西医论争结局的相关制约因素和文化思考^②。路彩霞则从晚清时期的庸医现象为我们揭示中西医冲突的一种内在根源。^③众学者都试图从各个角度探讨近代以来中西医之间纷争不断的原因，但大多还是关注于中西医学本身文化上的差异，而且基本上是从中医的角度出发的，论述传统中医遭遇西医冲击后的反应，还带有明显的“冲击—反应”模式的痕迹。同时，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只有论争的一面，其在执业、生活等方面作为医师个体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一直一无所知。单凭他们的论争是否就可以说明中医与西医之间的水火不容，也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四）医师与政府的关系

雷祥麟的博士论文《当中医遭遇现代国家》以及魏嘉弘的硕士论文《国医馆与中医国医化运动》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近代中医在国家政权影响下自身的演变过程及其对政府的反应^④。近来胡勇的《民国时期医生之甄训与评核》则回顾了整个民国时期政府对医师的管理，认为虽然政府颁布的法规很多都没有真正实施，但对医师的管理还是走向制度化，医生的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⑤。这些成果都对研究国家与医师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但国家与整个医师群体之间的互动的考察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五）名人的医学思想或医疗态度

不少学者从人物史、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些知名人物对待医学、医疗和医师的态度，从中探寻人物的思想轨迹及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变迁。如《郑观应的医事活动与医学思想》^⑥，《傅斯年与

① 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② 郝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③ 路彩霞：《晚清京津庸医问题初探》，南开大学医疗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④ 雷祥麟：《当中医遭遇现代国家》，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魏嘉弘：《国医馆与中医国医化运动》，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

⑤ 胡勇：《民国时期医生之甄训与评核》，南开大学医疗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⑥ 郑洪：《郑观应的医事活动与医学思想》，《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4期。

1934年的国医、西医之争》^①，《弃中择西：清人吴汝纶医学观的转变及原因分析》^②，《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③等。虽然这些成果没有直接论述医师本身，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那一时期医师、医学的社会影响。

从以上涉及医师群体的研究成果来看，从思想史、文化史角度关注近代医师问题的较多，从社会史、群体史关注医师问题的较少，大多论著就个别问题或现象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冲突，但对医师群体整体的研究则不足，近代以来医师的生存状态、发展趋势、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缺少深入的剖析。虽然对中西医之争的关注较多，但多集中从文化观念的冲突入手分析，关注医生个体本身的较少，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地带还相当多。

三 相关理论与概念

（一）理论视角

1. “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理论界的中心议题之一。其理论源于西方的政治思想，从宏观上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即洛克开掘的“社会先于、高于国家”的架构和由黑格尔传承的“国家先于、高于社会”的架构，这种将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理论，反映了近代西方国家和社会权力的分疏以及二者达到某种制衡的过程。其基本主旨是建构在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与王权相对抗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自主空间如“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构成分析，使得这一框架的使用在西方社会学界具有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效和阶段性内涵。^④中国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开始大量地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模式，从单纯的基层社会研究转向以基层社会研究为切入点，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邓正来为代表的一批学者

① 唐小兵：《傅斯年与1934年的国医、西医之争》，《书屋》2005年第12期。

② 汪维真：《弃中择西：清人吴汝纶医学观的转变及原因分析》，《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③ 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1期。

④ [德] J.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